

聆听沉默之音

战后德国小说与罪责话语研究

安尼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聆听沉默之音

战后德国小说与罪责话语研究

安尼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聆听沉默之音 / 安尼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675-26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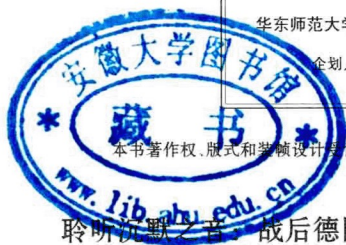
I. ①聆… II. ①安… III. ①小说研究-德国-现代 IV. ①I516.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132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均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聆听沉默之音——战后德国小说与罪责话语研究

著 者 安 尼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622-8/I.1262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导言 / 1

第一章 罪责问题的概念演变以及相关话语 / 22

第一节 罪责与罪责问题 / 22

一、罪责是什么? / 24

二、二十世纪的敏感词：罪责问题 / 27

第二节 “集体罪责”和战后初期的罪责争论 / 32

一、缘起：英美的“指控” / 33

二、德国教会方面形而上的回应 / 34

三、知识分子的客观及历史层面回应 / 37

四、问题的纠结：对“再教育”的心理反应 / 39

五、雅斯贝尔斯的积极回应 / 42

第三节 罪责话语中的常见概念 / 45

一、克服过去 / 45

二、对罪责保持沉默 / 52

三、耻文化与罪文化 / 55

第二章 《铁皮鼓》(1959): 战后小市民的罪责话语 / 61

导言 / 61

第一节 揭露跟风者之罪 / 63

一、“跟风”概念之由来 / 65

二、普通跟风者的罪责及认罪问题 / 68

三、特殊跟风者的罪责及认罪问题 / 77

第二节 罪责话语中的隐喻与象征 / 89

一、战后无“零时刻”——对复辟现象的揭示 / 90

二、“无泪的世纪”——集体的情感麻痹与沉默 / 101

三、黑厨娘——创伤意象中的罪责话语 / 115

第三节 罪责问题背后的哲学思辨 / 123

一、荒诞与含混：存在主义的罪责观 / 124

二、含混的罪责话语与缺失的解决方案 / 128

第三章 《德语课》(1968): 义务伦理与罪责 / 134

导言 / 134

第一节 重审“尽职”、服从与传统美德 / 137

一、“尽职”概念的历史变迁 / 138

二、官僚义务观、权威意识与个人罪责 / 147

三、茹格布尔的精神危机与秘而不宣的罪责话语 / 156

第二节 对“科学精神”的批判及情感缺失现象的反思 / 166

一、尽职之罪的变形——从心理学家说起 / 167

二、情感缺失造成的罪责——另一宗道德罪责 / 177

第三节 罪责话语的过渡 / 184

一、夹缝中的一代 / 185

二、克服父辈之罪责 / 186

三、暴力反叛的伏笔 / 189

第四章 《朗读者》(1995): 跨代之罪责与赎罪之可能 / 193

导言 / 193

第一节 多重的罪责话语及其内涵 / 197

一、法律罪责与道德罪责的碰撞 / 197

二、第一代之罪与第二代之责 / 204

第二节 跨代罪责的成因 / 211

一、先于罪的耻 / 211

二、克服羞耻与克服过去 / 220

三、罪责话语的历史转向 / 225

四、麻痹现象的遗传 / 234

第三节 赎罪的可能性 / 239

一、返乡母题与赎罪之旅 / 239

二、赎罪的部分实现 / 244

三、重返“集体的罪责” / 248

第五章 未完待续的思考 / 258

参考文献 / 272

附录: 罪责问题与文本研究相关文献 / 283

导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人类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战争和屠杀过后,关于纳粹历史的个人反思,也一度被掩埋在厚重的废墟之下。与各种领域的重建相比,道德重建最为曲折缓慢,它突出表现在人们对待罪责问题时的言不由衷。然而,二战结束六十多年以来,尤其在德国文学领域,一代又一代人一次又一次怀着求真之心,不断颠覆既成的认识、更迭熟悉的视角,为罪责问题的讨论和反思提供具有时代特征的鲜活案例。

社会的改变引发人们反观自身的同时,也迫使人们去重估历史。人们在过去一度执着的,如今要怀疑;一度信奉的,如今要唾弃;一度歌颂的,如今要贬低。对于纳粹罪责的认知,总是在不断反复中艰难前行。这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来自文学领域的长篇叙事作品以及政治、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的论著。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领域的罪责反思与公共政治领域的罪责话语可谓相反相成,纳粹的具体身份经历了从少数精英向多数民众的辐散,纳粹的形象经历了从魔鬼到凡人的更换,纳粹的归属经历了从“他们”到“我们”的转

变；尽忠职守从美德变成庸俗、不负责任的托词，甚至成为罪恶的助推器；羞耻与自尊变相成为丢却良知、助纣为虐的筹码。纳粹历史遗留下的道德罪责问题，成为战后德语小说历久弥新的创作主题。毋庸置疑，虚构的文学作品，是对宏观历史叙事的有力补充，与晚近的社会、心理、历史、政治哲学等研究成果相得益彰。

一、罪责反思的必要性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动辄即问：德国这样一个思想发达的国家，为什么会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并制造种族大屠杀这样的恐怖事件？对于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庞杂的历史疑问，任何一个单纯的研究视角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1945年以后，每谈及战争话题，德国人仍然找不出比“震惊(Betroffenheit)”更加确切的表达。而这个词本身的解释又是不确定的：它包含了“受到打击或者被影响之后的错愕、沮丧、惊恐”。^① 当人们走出震惊，必然要追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展开罪责问题的探索之旅。这是令人痛苦又欲罢不能的旅程，而罪责问题就好比西西弗斯面前的巨石。痛苦的原因不言自明，而欲罢不能的原因，正如某本专门以罪责为题的书之副标题所言，没有对过去的反思，便无法面对未来。

反思罪责必先从罪责概念本身谈起。从广义上看，罪责是“人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一个令人不安的基本事

① 参见布衣(Ian Buruma):《罪孽的报应》，戴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2页。

实”。^① 这个跨越哲学、宗教、法律等专业领域的概念，也是一个超时空、跨民族的文化现象，其含义随着时代变迁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人类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对罪责概念或迥异或相近的理解，也为我们理解相似的文化现象从而反观自身提供契机。本书所探讨的主要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德国这个特殊背景下的罪责问题。归纳起来，它首先指战争的发起者德国纳粹法西斯对二战中受害国、对以犹太人为代表的种族屠杀受害者所负担的刑事和政治罪责；其次指经历战争的一代德国人作为个体应当肩负的道德责任——如果他们对后代隐瞒战争罪责，便是一种有罪的沉默；最后，罪责问题还跨越时空延伸到与战争无关的德国人，他们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是政治的、道德的，也是形而上的。

纳粹的出现虽然有具体的历史传承原因，但均可归结到启蒙的不彻底。^② 这种不彻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拥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当中表现为理想主义和理性权力的过分扩张，从而导致现代化误入非理性歧途；而在普通市民、小市民阶层当中，理性的光辉遭遇了隔离和阻滞，并呈现畸形甚至倒退，这是导致希特勒上台、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泛滥乃至战后德国社会政治文化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德国灿烂的思想文化孕育的精神果实，在传递和普及过程中渐渐脱离现实，遭遇极端和激进思想的干扰；于是，理想主义在操作的过

① Gerd Haeffner: „Schuld“. Antropologische Überlegungen zu einem ebenso problematischen wie unverzichtbaren Begriff, in: ders. (Hrsg.), *Schuld und Schuldbewältigung. Keine Zukunft oh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Vergangenheit*, Patmos, Düsseldorf 1993. S.12.

② 这里的“启蒙”，是普遍含义下的脱离蒙昧无知，有别于18世纪欧洲针对中世纪的启蒙运动，也不同于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蜕变为工具理性的启蒙。

程中渐渐促成了知识分子与小市民阶层的泾渭分明。重思维、形而上的传统文学创作(内心流亡作品、宗教修身文学)在迫切的政治民主构建中被架空,形成远水不解近渴之势。二战结束伊始,在联邦德国展开的罪责问题大讨论并未对德国的市民社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就是一个明证。而由政府包揽的自上而下的认罪姿态,反而助长了逃避个人罪责、一切从零开始的自欺心态。对于这些问题,文学领域也许不是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的,但却是表现得最为深刻的。以普通人的故事补充宏观历史叙事,对于反思罪责往往更具说服力。因此也可以说,战后德语小说,是“外界认识德国历史的一条虚构之路”。^①

以战后德语小说为蓝本研究德国人如何反思罪责问题,不但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可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某种启蒙效果。结合历史社会语境阐释罪责问题的含义,选取经典文本展开主题研究,既可了解战后德国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又可弥补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从我国德语文学研究现状来看,对战后文学作品尽管始终保持关注,但罕有以罪责问题为核心展开的主题研究。^②这也就更显出本书的意义所在。目前我国的德语小说研究或以文本中的叙事方式为主,辅以罪责问题作为延伸;或以某位作家的生平作品为标题,把罪责问题作为作品研究的一个侧面;文学研究领域真正以罪责问题为对象进行主题研究的范例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从

① Siegfried Lenz: Geschichte erzählen — Geschichten erzählen. In: *Über das Gedächtnis, Reden und Aufsätze*, Hamburg 1992, S. 32.

② 在针对格拉斯小说的专项研究中,冯亚琳曾就“但泽三部曲”中《铁皮鼓》的“罪责主题”以及《蟹行》和《剥洋葱》中的“罪与赎”撰文进行简评或综述。参见冯亚琳:《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第 36—40 页,以及第 138 页以下。

研究的客观性上看,作为中国人,一个看似“隔岸观火”实则也曾罹患过战乱之苦、理想主义泛滥之灾的“局外人”,不需要面临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尴尬,可以避免先定身份造成的情绪混乱,同时又可以在诸多不言而喻之中找到反观自身的镜子。

二、文本选择的策略

二战结束至今,德国知识分子对战争罪责的探讨和反思从未停止。德国在四十年里经历了战后重建、战犯审判、学生运动、历史学家之争、两德统一。政治领域以及文化领域的每一次轰动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即历史与现实、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在罪责话语下发生了冲突。首先,罪责问题将战争一代与战后一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纠结在一起,在父辈与子辈的传统代沟之外,又呈现出被告方与控诉方这一新的关系。其次,反思罪责并未因战犯或受害者的死去而退出历史舞台;而生者中无论是当年的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深陷纳粹阴影,无法释怀,于是不断通过回忆或虚构还原历史,为反思和记忆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

经历了经济重建的德国社会,首先是自上而下地进入到对罪责问题的不反思中。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回归内心、保持沉默之后,战后德国小说家以恢复民族乃至人性良知为己任,对罪责话语进行重构,借助优秀的长篇小说彰显和剖析罪责问题。小说这一庞杂琐碎而不失宏大深邃的叙事体裁,恰恰对应了罪责问题的复杂性。从文学史角度看,德语现实主义小说有悠久的传统,战后小说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德语成长发展小说因子,而且还记录了德国社会心理的成长发展,具备

启蒙社会的效应。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以及不谋而和的开放式结局,又体现了罪责反思的艰深和启蒙大众在当代的困境。另外,德语文学中的战后小说和当代小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屠杀小说或战后小说这些称呼,仍适用于当下同主题的作品。战后已经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对作品主题的确认。反思历史,尤其是反思纳粹罪责,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罪责问题构成讨论诸多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战后德语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关键词。基于对内容与载体之间的亲和度,本书以三部富有影响力的战后德语小说为例,研究战后德国如何对罪责问题进行反思以及对反思进行再反思。

本书选取的三个文本《铁皮鼓》、《德语课》和《朗读者》分别诞生于战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对当时社会围绕罪责问题展开的思想冲撞和情感负荷进行了直观的表达,更引发后世读者自觉深入反思,从而在历史与现实、文本与读者之间铺设桥梁。格拉斯、伦茨、施林克这三位作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代人,其创作都围绕罪责问题展开,并至少突出了罪责话语中的某一个具体议题,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衔接——他们都以各自的角度历史性地表现了无力哀悼和克服过去的艰难。三个文本所反映的罪责问题各有侧重,在某些内在层面又相互融和;三人均从微缩的个人体验出发继而达到一个超越地域、民族、时空的高度;三部小说的叙事均发端于主人公的青春期,都采用由下而上的视角展开回忆;均以第一人称书写,从不同角度揭示人们在“克服过去”中的心理障碍及原因;三位作者均在批判的视角中注入哀悼之情;小说主人公大多是市民阶层或小人物,人物塑造既饱含个性化色彩,同时又浓缩体现了德国大众的社会性格。当然,并非每部小说都能就

罪责问题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通过考察德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罪责问题,揭示人性的亏损和社会启蒙的盲点。由此看来,这三部小说的结局与其说是悲观的,毋宁说是寓言式的。

在这一个个寓言中,整个德国战后社会好比一个未成年人,就连成年人也成了盲目成长、亟待启蒙的未成年人。未成年视角在三部小说文本中成为独特的风景,传统德语成长发展小说被旧瓶装新酒。反成长发展模式出现了,是社会而不再是个人成为成长发展的首要问题:身体成长出现停滞甚至倒退,隐喻着社会发展的畸形态势;随处可见的成人社会对历史的沉默,被视作另一种未成年状态,未成年人在罪责问题上享受的特权被整个社会所分享。未成年社会与成年社会成了社会现实与启蒙理想的代名词。在未成年与成年人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生理或心理界线,未成年特征符合了大多数成年人回避责任的心理。战后小说一方面刻画并批判了这种集体现象,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一些问题个体。这些个体因其各自的特殊情况而成为罪责问题的典型或特例,往往是最有争议的个体为罪责问题的反思提供了破界(有罪与无罪、施害与受害、生理与心理、主动与被动)的契机。

罪责问题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它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在,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战后德语文学,尤其是小说作品,在拨开层层叙事技巧、光怪陆离的美学外衣之后,那个隐藏的并不深的内核便显现出来:罪责问题几乎纵贯二战至今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在以罪责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里,几种范畴的罪责往往交错在一起,凶犯不再附着于一种身份,原有的身份界定被打破,于是便出现了“有罪的受害者”和“无辜的凶犯”。集体的罪责也不再作为个人罪责的对立面出现,而

是成为一种有助于沟通的心理基础、文化现象。如果说这些小说都是由地道的前西德作家所写,是一致的“凶犯视角”,在目前的德语文学研究界似乎更容易被接受。虽然本书对所谓的“凶犯视角”持保留态度,但在具体操作上,为保持文化心理的一致性,选择的文本无一不是出自所谓“凶犯”或“凶犯的下一代”之手,而将前东德、瑞士、奥地利的德语作家作品排除在外。1945—1990年之间的德国,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在东西两方形成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心理。尤其在反思罪责问题方面,前东德与前西德之间存在极大的鸿沟。鉴于罪责问题在前东德有完全不同的具体含义,因此前东德小说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虽然纳粹战争在本土之外的德语文学圈同样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思,但是处于不同的民族意识(Nationalbewusstsein)之中,我们无法在奥地利和瑞士地区的小说作品中发掘出与本土德语文学在情感层面上的传承性;而情感纠缠在罪责话语中的缺失与重现,乃是本书重点探讨的问题。因此,瑞奥文学也不在本书研究之列。

三、方法论与文献综述

本书遵循文学阐释学的宗旨,以小说文本为核心,辅以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人文科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对文本中的罪责话语进行分析论述;在紧扣文本现象的前提下,融合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重要史料,力求令论述充分而客观。在分析作品的过程中,本书将以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两个分别重实证、客体性的宏观方法和重个性、主体性的微观方法作为主要支柱,引入20世纪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同时兼顾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经

典以及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丰富阐释空间。

1945年以来,德国社会对罪责问题曾展开多次讨论,无论是1945—1949年间在知识分子和政界等上层社会展开的罪责问题大讨论,还是四十年后的历史学家之争,无论是各种历时漫长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战犯审判,还是后来接二连三爆光的战前污点身份,都体现出罪责话语的复杂和持久;对纳粹历史的认识和判断也渐渐呈现多元化,甚至出现观点的倒退或反复。二战前后,历来扮演聆听忏悔角色的教堂和宗教经历了长期的黯淡。真正撼动社会上下的,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心理学界对“第二罪责”问题的研究,正如对集体罪责和个人罪责的探讨,早在二战结束伊始就已现端倪。社会心理学与文学这两种学科在罪责问题上互为支持,观点不谋而合。从亚历山大·米彻利希提出的“无父社会”、玛格丽特·米彻利希的“榜样时代的结束”继而到“未成年社会”一说,不仅为罪责问题的反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在德语小说里也得到了有力的文本回应。

战后德国反思罪责问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高潮,这种高潮体现了罪责问题研究的跨学科性。无论是政治学上对克服过去所做的阶段性总结,还是历史研究中的代际划分,乃至心理学上对德国社会的集体诊断,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整体上看,来自哲学、历史、政治、心理等学科的德国知识分子对罪责的反思成果,加深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甚至影响到文学作品本身。在文本分析和论述过程中,本书将采用跨学科的思考模式,借鉴与罪责话语相关的理论和著述;在引荐理论方面,我们应不仅仅引介前人的成果,也应特别注重这些成果得出的方式方法、时代背景以及研究者本人后来的修正和反思。

二战结束前后,针对纳粹罪责问题与德国人的关系,德语文学界最有影响的声音首先发自流亡作家。通过托马斯·曼事件,德国人在战后对待罪责问题的基本态度已经十分清晰。1945年5月18日,曼在《谈德国的罪责》一文中将德国称作“人类丑陋”的象征和“邪恶的代表”,认为“希特勒主义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幽深的刑讯室。如今刑讯室的厚墙已被打破……德国让整个人类感到了恐怖。”^①1947年,曼指出“对之前十二年悲剧负责的不应该只是德国的领导阶层;纳粹在德国人的思想特征和传统中有一定的根基。在纳粹专政的最初几年里,德国的确群情振奋,并相信纳粹。现如今的窘迫是希特勒政府及其施政措施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为此德意志民族付出了他们的财产、智慧、勇气和行动力。德意志民族不能由外来力量教化转型。每一场行之有效的转型教育必须由内而发。”^②曼的观点遭到了德国人的集体抵制,人们纷纷指责他冷酷无情、背离祖国,只有作曲家哈特曼等少数人没有将罪责反推到流亡的曼头上,而是对其观点表示了赞同,指出德国人是在实行罪责防御,不爱听真相。这种疏远和分裂并不是曼造成的,而是德国人自己造成的。^③如果说流亡作家对德国本土的判断有隔岸观火之嫌,那么五十年代,沃尔夫冈·克彭(Wolfgang Koeppen)的三部曲《草中之鸽》(*Tauben im Grass*)、《温室》(*Das Treibhaus*)、《死于罗马》(*Tod in Rom*)所遭到的冷遇,则恰恰是因为小说对战后没有被及时反思的

① 参见李昌珂:《德国文学史》(第5卷),译林出版社2008,第15页。

② Thomas Mann: Die vermiedene Deutschland Reise 1947. In: *Die fragile Republik. Thomas Mann und Nachkriegsdeutschland*. Herausgegeben von Stephan Stachorski, Frankfurt am Main 1999, S. 66.

③ 参见同上。

纳粹罪责进行了冷静的揭示和批驳。可是,本土作家的反思作品不是寥寥无几,便是经年遭到同样冷遇。可见,对于当时的德国社会而言,任何关于个人层面的罪责反思都是“不合时宜”的。

与文学领域曲高和寡的反思呼吁相比,在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存在着反思和复辟相抗衡的局面。1945年冬,纳粹时期被迫流亡到瑞士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回到德国后,在海德堡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哲学讲座,主要分析德国当代历史和战后社会现实。讲稿后来被编辑成书,名为《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这是罪责问题在战后第一次作为专有名词被提出并得到系统阐释。罪责问题从此成了战后至今悬在德国上空的一把利剑。雅斯贝尔斯将其划分为四重范畴:刑事犯罪、政治犯罪、道德罪责以及形而上的罪责。雅斯贝尔斯论述的重点在于后两重罪责,把德国的希望寄托在团结和沟通之上。这部著作在战后多年被人漠视,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才在一批政治学者的努力下得到应有的重视。雅斯贝尔斯的罪责概念,是本书论述罪责问题的主要依据。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基于自己多年对德国问题、极权问题成因的思考,在二战结束之初撰写并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作品,提出极权政治与人的孤独和孤立密不可分。她的许多观点在战争期间即已形成,并散见于后来的其他作品当中。直到六十年代,根据艾希曼审判发表的一系列报道汇总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恶之平庸性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出版,阿伦特的观点如同两块巨石激起千层浪。这两块巨石均与罪责问题有关:一是提出平庸之恶